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述评

江 勇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者们不断开创适应时代要求的伦理学研究新局面。伦理学理论体系从无到有,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日趋完善,伦理学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国内外学术交流成绩斐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但是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可谓是硕果累累的学术丰收期。

**关键词** 中国伦理学 理论体系 伦理思想史 应用伦理学

江 勇,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46

## 一、理论体系:创立、完善、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解放思想,中国伦理学研究者在坚持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跳出旧伦理学的框架,不断开创适应时代要求的伦理学研究新局面,建立符合国情需要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专业化与系统化,为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 1.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与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新的道德现象与道德问题的产生,伦理学理论体系建设亦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及分配方式等日趋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化。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变革的时代给予中国伦理学的巨大考验。

继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伦理学课程之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陆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原理等课程。新中国伦理学奠基者罗国杰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不仅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与教学体系结构的创建,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伦理学学科恢复发展的重要标

志。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道德实践和道德活动三大体系出发,初步构建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几经修订的《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教材问世,建立并完善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道德规范体系。该体系确定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和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sup>[1]</sup>这一架构以道德现象为对象,以利益与道德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内各地自编教材的范本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带来了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在罗国杰之后,大量的伦理学家为完善伦理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努力。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分为“理论篇”“规范篇”“实践篇”三类,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实践伦理学的有机统一,从对道德的本质和特殊性入手展开全书篇章结构<sup>[2]</sup>。夏伟东编著的《道德本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道德的产生、演变与道德规范本质及道德、良心、幸福的关系着手,结合实际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魏英敏、金可溪主编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基础上,将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统一,以史入论、以史释论、以史出论,并将人道主义纳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王小锡、郭广银主编的《伦理学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构建了“人的关系-人-人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提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与道德目的是实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生的完善”<sup>[3]</sup>。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原则,充分运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经济学、生理学、哲学等知识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以构建新的规范伦理学。甘葆露的《伦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对道德的起源、本质、结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力图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把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章海山、张建如主编的《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分析研究了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介绍了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国内外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唐凯麟主编的《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构建出“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和个体在道德上的和谐统一”<sup>[4]</sup>这一新型框架。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伦理学基本原理与方法,从理论与方法两部分着手,通过对辩证思维方式与伦理学思想史的考辨,探究全面、辩证的伦理思想方法形成的基本路径。王泽应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的伦理思想进行探讨,历史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的整体样貌。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阐述伦理学是一种怎样的研究及其历史演变轨迹后,对伦理学基本概念进行研究,并从交往伦理学出发阐述了哲学的伦理学。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特点、基本内容做了深入分析,通过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相关理论的对比分析,

[1]罗国杰:《罗国杰文集》(上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王小锡:《中国伦理学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3]王小锡、郭光银:《伦理学通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4]唐凯麟:《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韩东屏的《人本伦理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将人视为道德的主人,将道德视为满足人的工具。并通过对古往今来的道德原则的检讨,提出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至善,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条件的“人本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伦理学》编写课题组(以万俊人为首席专家)编写的《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详细阐述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探讨了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总结了伦理学的学习方法与途径。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思考与解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智慧进行探讨,展现其对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

不难看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视角,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给道德安置了一个客观有效的社会生活基础”<sup>[1]</sup>。然而,作为面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学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强调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的现象,这会导致伦理学无法真正实现学科独立。

## 2. 不同视角下的伦理学相关理念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伦理学家们愈发感到将“现实的人”引入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诸多力图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体系伦理学涌现出来。

王海明的《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运用道德终极标准衡量行为事实的善恶,推导出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总原则“善”和善待他人的道德原则。他构建出优良道德体系伦理学,主张:“伦理学乃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及其实现途径的科学。”<sup>[2]</sup>李萍主编的《伦理学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个体出发,进入社会交往秩序,最终回到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具体作用领域,构建出新的伦理学体系。宋希仁的《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探讨了人生是什么、人生应当是什么、人生能够成为什么等问题,展现了人生的真、善、美。肖雪慧、韩东屏等撰写的《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指出道德是人在自身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并服务于人的需要的。“人需要道德,创生了道德,又体现着道德。”<sup>[3][4]</sup>他们强调“个人是最真实、最根本的主体”<sup>[4]</sup>,立足于“人是道德的主体”这一核心命题,系统勾勒了主体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向传统的道德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对未来道德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何怀宏的《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将基本义务作为伦理学关注的首要目标,建立了以恻隐、仁爱为道德之根源,以诚信、忠恕为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之枢纽的理论体系,一改伦理学重视“高线伦理”而忽视“底线伦理”之风。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从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运作与伦理观念入手,重建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根本要求的新伦理类型,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内在逻辑为基础,初步建立人学价值论伦理学体系。其后,万俊人的《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进一

[1]万俊人:《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3][4]肖雪慧、韩东屏:《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第1页。

步阐释其人学价值论伦理学体系。李德顺的《新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人的价值世界是无限多样化的,也是多元的,最重要的价值主题是作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尺度的“人”本身。任丑的《伦理学体系》(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人的自我为逻辑起点,以自由为本体,以责任、权利、幸福、善恶为主要范畴,探究伦理学的内在逻辑和外形态,诠释理论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后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展示伦理学的自由品格和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已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我们固然可以进行诸多创新性的理论研究,然而理论体系的创新不等于自说自话,必须着眼于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道德”。只有在对“道德”这一核心概念形成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才有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诸多新伦理问题,伦理学理论尚未能及时予以反映并给予指导,伦理学理论离解决社会道德问题还有一定的距离。

## 二、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古今结合、中外兼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某些变化。众多伦理学家在探讨社会道德变化及市场经济中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时,也不忘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进行梳理、研究。

### 1.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研究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具有一个鲜明特征,即始终与政治、哲学思想紧密结合,未与这些思想相分离,伦理思想融于政治、哲学等学术史之中,未曾独立。因而,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梳理研究是一项浩大工程。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国伦理学家迎难而上,撰写出一部部伦理著作,梳理出传统伦理学的发展脉络。

陈瑛的《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洋洋洒洒60万字,对先秦社会与伦理思想、德治与法治、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等进行梳理研究。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端、中国伦理学说史的对象、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及研究中国伦理学说史的意义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中重要人物的重要伦理思想。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诞生,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南北朝隋唐时期、宋至明中叶时期、明末清初的伦理思想。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构建出较为完备的中国伦理学思想通史理论体系。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历史年代顺序,从天人论、人性论、义利论等焦点问题出发,以论统史,史论结合。温克勤编著的《中国伦理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系统地阐述了自先秦至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演变。朱贻庭的《中国传统道德6辨》(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梳理整合、反思总结,深入探讨传统伦理的古今传承与创新,思考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并试图重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家园”感的、集中体现现代精神文明价值导向的“中国伦理学”逻辑结构和范畴。此外,张锡勤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姜法曾的《中国伦理学史略》(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殿奎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纵横》(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许建良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多种视角。

从现代伦理学家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梳理研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我国古代伦理学家长期探讨与争论的问题:道德的根源与本质问题、道德的最高原则问题、道德修养问题等。关于道德根源与本质问题,唯物主义伦理学家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受物质水平制约的,人性善恶是在后天环境中培养而成的,道德评价标准源于社会利益。唯心主义伦理学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有意志的“天”,人们道德行为的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依据在于“天理”,人的善恶都是先天注定的,否定物质利益对道德的作用。关于道德最高原则问题,我国古代伦理学家亦有长期争论——从先秦时期的“义利之争”一直持续到宋明时期的“理欲之辩”。儒家重“义”轻“利”,认为道德最高原则是仁义。墨家主张“义利并重”,强调“兼爱”“交利”。法家重利贱义,注重赏罚。道家主张无为、尚朴,超脱义利。关于道德修养问题,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始终将个体的“修己”与“治人”“治国”紧密相连,从道德修养出发探讨人生的意义。

## 2. 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

西方伦理思想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历史颇为久远,存在着众多学说理论,有着不同于东方的伦理思想传统。从体系结构上来看,西方伦理学可分为元伦理学(从逻辑与语言学角度分析道德概念与判断的学说)、规范伦理学(通过对人类伦理行为的善恶价值分析来研究道德起源、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学说)与美德伦理学(关于人类优良道德的实现与优良道德品质-美德养成的学说)三类。我国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与述评阶段逐步推进到如今的系统性理论成果不断涌现阶段,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周辅成编著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作为我国系统研究外国伦理思想史的开创性著作,较为全面地汇集了西方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资料。章海山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西方伦理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宋希仁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深入研究西方伦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的基础上,梳理出西方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阐明西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内容及其多样化的形态。王小锡的《当代西方人生哲学》(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在充分搜集、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意志主义进行了客观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宋希仁编写的《当代外国伦理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国家和地区分别阐述当代外国伦理思想,与按思潮和学派分别阐述外国伦理思想的著作不同,为集中、完整地认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伦理思想,为深入比较东西方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伦理学各种思潮、流派的发展脉络与代表性观点。龚群、陈真著的《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考察分析了当代英美元伦理学、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论和德性论的发展、理论缘起和方法特征。江畅主编的《西方德性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西方德性思想史的著作。该书对西方自古至今的德性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述,力求揭示其演进过程、精神实质和显著特色,着重阐明了西方主要思想家德性思想的来龙去脉、基本观点、内在逻辑、突出贡献和历史影响。

## 3.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

我国学者采用多种方法对马克思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基本原理和发展逻辑梳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

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6年版),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力图用恩格斯的“合力论”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统一的思想阐述道德的历史联系及其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章海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系统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伦理思想,是首部较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术著作。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进行历时性梳理研究,完整、深刻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刘琳的《〈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从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资本论》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综合多学科对《资本论》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伦理思想。刘丽编著的《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演进逻辑与马克思的变革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演进逻辑切入,系统梳理了伦理道德关系的发展,论述了马克思通过批判、改造以往传统,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思想史研究无疑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也能比较明显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落后于对中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落后于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研究,对西方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介绍与翻译。同时,部分学者对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停留于概念和历史,并未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创新与突破。伦理学者们应当本着“扬弃”的原则,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外国伦理思想进行革故鼎新式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唯有如此,方能在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中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 三、应用伦理学:研究视角转向推动学科发展

在经历早期伦理学理论研究热潮之后,我国伦理学家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应用伦理学,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势头日益兴盛,为伦理学成为当前哲学学科中的“显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探讨了生命科学技术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打开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大门,论证了伦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后,王小锡的《道德资本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更是在此基础上创造性阐释“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代表性观点,并引发国内外伦理学界广泛关注。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评析了现代经济伦理问题,如市场的附魅与祛魅、公正与道义、劳动与“工作伦理”等。甘绍平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西方应用伦理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阐释当代西方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展现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与特点,从而完善应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与整体框架建构。周中之的《消费伦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析了消费伦理现状,探讨了其实质与人们应当坚持的内在原则。其后,周中之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消费伦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通过对比中西消费伦理思想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轨迹,揭示消费主义是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两大层面论述了消费伦理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卢风、肖巍编著的《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是首部系统的应用伦理学中文教材,在探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用伦理学重要研究领域的独特见解。孙春晨的《市场经济伦理研究》(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5年版),从逻辑、历史和现实三重视角,讨论了市场经济伦理丰富内涵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如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市场经济伦理的内涵、“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特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正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余达准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论述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提出了鲜明的、操作性强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李建华的《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通过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李建华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核心价值构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及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之中,引领着我国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源流,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探寻其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张树峰的《医学伦理学》(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年版),作为用于职业培训的专科教材,体现了医学伦理中理论与实践、专业与伦理学、课堂与临床的紧密结合。章海山、罗蔚主编的《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用近二分之一篇幅对应用伦理学进行介绍与阐释,提出应用伦理学应具有普世性、交叉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甘绍平的《人权伦理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从人权的视角,对平等、公正、关爱等重要伦理范畴及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德性论、义务论等伦理学派的价值旨趣进行了阐释与解析。刘可风主编的《企业伦理学》(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介绍企业伦理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两个角度对企业中产生的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儒商伦理和社会责任投资等当代企业伦理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看法。陆晓禾的《企业责任:中国中小企业标准探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以上海富大集团为案例,对中国中小企业标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王正平的《应用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介绍和评析了十年来应用伦理学方面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应用伦理学是探讨道德生活具体问题的“实践伦理学”。张春美的《基因技术之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基因伦理为主题,关注当代基因技术的发展成果,通过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与沟通,展现了伦理研究与人文精神在高新技术发展中的意义。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活跃的学术研究氛围为应用伦理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环境,应用伦理学不仅能紧贴日益变化的伦理实践,与时俱进,也能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挥出实践指导作用。然而,其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当前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仍存在“各分支彼此隔离,缺乏交流状态”<sup>[1]</sup>、“这种分割式的研究不足以达到对道德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引导”<sup>[2]</sup>。在当前应用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跨学科学术交流会议仍比较罕见,伦理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同时,尽管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都和现实中的伦理实践紧密相连,但真正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的要求却依旧困难重重。

#### 四、道德功能:充分阐释、推陈出新

作为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道德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能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对道德功能的研究从未停止,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打破诸多学术禁区,对道德功能的研究得以从不同视角展开。学界对道德功能进行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也促成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热潮。

[1]罗国杰:《十年来伦理学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道德与文明》1991年第1期。

[2]罗国杰:《十年来伦理学的回顾与展望(续)》,[天津]《道德与文明》1991年第2期。

改革开放之初,学者们对道德功能的探讨首先围绕着“道德法庭”展开。王复初主编的《道德法庭》(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李宏图的《应该肯定“道德法庭”的社会功能》(《开放时代》1984年第6期)、朱云洲的《“道德法庭”能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吗》(《社会》1984年第1期),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审视与探讨。学者们大多认为,道德法庭是社会通过一定的道德标准或公众认可的准则对某种思想行为进行的评判裁决。道德法庭不作为专门的国家机构存在,而普设于社会和当事人内心;其裁决不存在法定程序,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的道德标准与公众一致认可的准则;道德法庭权威源于社会舆论与当事人内心信念,且裁决效力源于当事人本身。在对其存在合理性的争论中,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与法律本属不同概念,如果“以感情代替法律”,本身就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sup>[1]</sup>;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约束力,每个人可以对不道德的人与事在道德上进行“起诉”,同时自身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也会被人“起诉”,这有利于人们道德素养的提高与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在“道德法庭”引发广泛讨论后,伦理学界开始着眼于对道德功能的其他方面进行探讨。夏伟东的《略论道德的本质——兼与肖雪慧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李健的《论道德的激励功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谢洪恩的《论道德的功能和本质》(《哲学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都对道德功能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从道德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出发,夏伟东认为,道德功能在于维护集体利益,“道德的崇高性,道德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道德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sup>[2]</sup>。肖雪慧则否认道德为社会发展所需要,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及生命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强调道德的个体功能。关于道德功能的分类,李健提出,“道德的激励功能不是低于道德调节功能的一种次要功能”<sup>[3]</sup>,而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分为社会运用的外在机制与激励对象自身运用的内在心理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市场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的问题。除了重视依靠法律手段,人们也越来越重视通过道德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这一时期,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被广泛讨论,道德的经济作用被充分阐释,诸多创新性理论被提出,如: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生态道德等代表性观点。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界分为两派:以樊纲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多数经济学家则认为,道德力量是市场经济中除去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外的“第三只手”。伦理学界对经济与道德的关联性问题展开讨论。万俊人认为,应从经济伦理视角揭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樊浩提出以伦理为主的“伦理-经济生态复归”<sup>[4]</sup>。王小锡认为:“物质利益实现的本身,并不只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目的,更重要的又是实现着人的完美性的伦理道德目的。”<sup>[5]</sup>葛晨虹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提出:“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手段,又是目的。”<sup>[6]</sup>道德在经济活动中有何作用、有多大作用、如何作用等问题被广泛讨论。有观点认为,道德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因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自利,本身与道德的利他天然对立,道德越发展,经济越凋零,

[1]朱云洲:《“道德法庭”能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吗》,〔上海〕《社会》1984年第1期。

[2]夏伟东:《略论道德的本质——兼与肖雪慧同志商榷》,〔北京〕《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

[3]李健:《论道德的激励功能》,〔上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4]樊浩:《伦理-经济的生态复归》,〔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6]葛晨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功能定位》,〔北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4年第7期。



反之亦然。以王小锡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的道德是促进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出“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代表性观点,而且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系统分析。余谋昌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7期),在伦理学界掀起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讨论热潮。对“人类保护生态,是因为人类自身利益,还是因为被保护对象自身具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的问题,大体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回答。甘绍平认为:“我们已有的道德理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就足以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行爲提供理据与作出论证。”<sup>[1]</sup>曹孟勤却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找寻人性的依据<sup>[2]</sup>。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道德功能的探讨涉及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经济、医学等等,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与成绩,然而其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即使作为“显学”的经济伦理学,仍未构建出完整清晰的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实践“镜像图”。尽管诸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是依旧未能在理论上真正反哺、指导实践。当前,提升理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是新时代对伦理学提出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伦理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伦理学学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组建伦理学教研室;1980年,中国伦理学会成立;1982年,《道德与文明》(原刊名《伦理学与精神文明》)创刊;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首届伦理学博士生;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伦理学研究》创刊;2004年,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被评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中国国家图书检索系统中,伦理学著作从1979年出版的3本到如今15000余本,伦理学相关文章从1979年发表的155篇到如今的近50万篇。

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思想的碰撞也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伦理学大会、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以及各高校、研究机构与各应用伦理学学会举办的专业性学术研讨会等,为伦理学者们交流、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越来越多的中国伦理学者参加其他国家与地区召开的伦理学国际研讨会议,发出中国声音。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不进行实证调查,闭门造车;醉心于抽象思辨,脱离具体实践;研究方法单一、片面,过度推崇西方伦理思想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当代伦理学者们要充分认识到基于单一的学科视角、研究方法而得出的成果都存在片面性。任何理论上的创新都必须最终落实到实践上才有意义。伦理学要真正做到服务现实,必须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提出的要求。只有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在实践中发现、捕捉、吸纳富有表现力、感染力和生活气息的话语,探索具有人民性、生活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伦理学研究才能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sup>[3]</sup>。

[责任编辑:洪峰]

[1]甘绍平:《我们需要何种生态伦理?》,〔北京〕《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

[2]曹孟勤:《生态伦理是人之为人的象征》,〔太原〕《晋阳学刊》,2006年第6期。

[3]曾建平:《学科走向: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北京〕《人民日报》2018年8月20日。